

## 青銅器與西周封建

人類智能的進步可以體現在工具的製造上。遠在石器時代，人就懂得就地取材，以石頭和泥製造出工具和陶器，方便勞動及儲存物品。隨著農業發展，食物的來源穩定下來、人口上升，人也有更多時間投入創作更精美的工藝品。考古挖掘出形形色色的青銅器，歷史學家推定它們是商和周時期的產物，因此將這段作器世代統稱為「青銅時期」。

故此我們認定青銅器是研究商周兩代的重要一手資料——青銅器本身就是歷史的敘述者，而它身體的銘文記錄著它的身世遭遇，反映當時的政治環境，是考究西周封建制度不可或缺的證據。

### （一）青銅器的出土及種類

中國最早的青銅發現在甘肅的馬家窯內，經校正時間約為前3000年<sup>1</sup>。現有的西周青銅器基本出土於周原<sup>2</sup>附近，也有在甘肅、寧夏和大西北的發現，證明周幅員之大<sup>3</sup>。

青銅器的種類非常多，功能也很廣泛，它們可以用來承載食物、又可以是禮器、樂器、兵器、農具或裝飾品，不但有觀賞價值，同時具備實用功能。事過境遷，受戰亂、各種人為因素和自然災害影響，存世而又保存良好的青銅器只有少數。

### （二）青銅器的重要性

青銅器的重要性有三點：

1. 青銅器在歷史時段當下鑄造，可反映時代脈動。一經鑄造就難以刪改，因此整件器物都是可靠的原始資料。
2. 青銅器並不純粹是器皿或裝飾，某些青銅器的器體還刻鑄的文字——金文<sup>4</sup>，為研究提供文字記錄。採取「二重驗證法」，以銘文為基礎，對照《周禮》、《尚書》等古籍所記，兩者互相補足，又避免「孤證不立」的情況，可進一步核實古書內容的真偽。

<sup>1</sup> 李學勤，《青銅器與古代史》，（台北：經聯，2005），頁2

<sup>2</sup> 周人的原都，周、召二公的封地。文王都豐、武王以下以鎬為都。李學勤，《青銅器與古代史》，（台北：經聯，2005），頁12

<sup>3</sup> 李學勤，《青銅器與古代史》，（台北：經聯，2005），頁13

<sup>4</sup> 又名金石文或鐘鼓文

3.青銅器造價高昂，極費資源鑄造，所以在商周時期擁有青銅器必然身份非凡，既有官方認可，也是財富的象徵。這種高端的製造技術標誌著中國科技史的新高峰，間接反映西周皇室和貴族對財富的積累達到一個不可思議的高度。

《史記》記載秦始皇命人在泗水打撈周鼎一事。為迎取該鼎，秦始皇還特意齋戒沐浴，但事與願違，即使動用千人，也是求而不得<sup>5</sup>。縱使君臨天下、隻手遮天的秦始皇也苦苦求鼎，該事例足見青銅器的重要性：它不但是身份的象徵，彰顯了持有者的社會地位，同時亦有宣立政權合法性的內涵。

### （三）製造方法

青銅器的外形和銘文內容一般分別不大，這是因為鑄造青銅器的過程非常複雜：工匠先將，紅銅、錫、鉛等融化成合金<sup>6</sup>，調配至適當比例，再倒入模具塑型高溫燒製。製作青銅器所需時間、資源、人手遠比製作石器和陶器來得要多，而且技術也是十分複雜，只有極為富裕、掌握重大資源的政權才能製造。商製青銅器，從造型的複雜性和銘文長度比不上周製，這也反映周族的經濟、科技實力凌駕於商；也可推敲至少在西周初期，皇室貴族壟斷了青銅器的製造。

### （四）閱讀青銅銘文

青銅銘文詳細記錄了時間和地點，後代才能以此為線索，重塑周的歷史。不僅如此，我們還能從中推敲周的官職制度、祭祀儀式等一系列政治、文化、社會息息相關的事務，是歷史研究的巨大助力。不過，古文字與現今漢字的讀音和意義相差甚遠，青銅器上的銘文對現代人來說就顯得佶屈聱牙。雖然如此，銘文有固定的格式，要讀懂並不難。

就以常見的訓誥和冊命銘文為例，大部分銘文天都明確標示時間（以天干地支表示），再點名地點。這也間接證明周王的活動範圍不只是在首都，周王有巡視國邑的職能。封獎冊命多數在宮殿進行儀式，以表莊嚴。

接下來，王會先回溯歷史，述祖先之德，許多銘文都會記錄文武二王克商建周一事。繼而會有一段對受封者或其祖先的讚揚辭，對他們的服務表示肯定。若此乃冊命，王就會宣布任命的官職並對其加以勉勵。

---

<sup>5</sup> 司馬遷，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：「始皇還，過彭城，齋戒禱祠，欲出周鼎泗水。使千人沒水求之，弗得」

<sup>6</sup> 馬承源主編，（台北：南天書局，1991），頁 492

緊接著便是王的賞賜，銘文會列出禮品的名稱和具體數量，這些禮品都有一定的象徵意味。受封者感激王的封賞並因此作器，銘刻上希望「子子孫孫永寶用」之類的祝願辭。<sup>7</sup>

閱讀銘文需要注意的事項：

閱讀銘文時，讀者需要留意兩點。

第一，受封者多對周王心存感激，而且青銅器的製造過程或由王室監控，所以我們也不可忽視青銅銘文有政治傾向，其所言之事乃王室觀點<sup>8</sup>。

第二，由於青銅器是後製的，所以會出現時間誤差，讀者需謹慎。比如該器是記武王對答謝諸侯為其服務，因此有所封賞，那麼此成器時間可能要到成王時期。這是因為製造青銅器需耗費時間和收集物料，得到王的嘉獎是件大事，作器者必然隆重其事，盡可能把最好的物料用來製造。另一種可能就是後人作器紀念祖先的偉績，並藉此彰顯家族地位。

### 青銅器反映商亡周衰的歷史

許多青銅器都刻有銘文，這令青銅器不只是器具，而是歷史的一部分。西周早期紀念性銘文多與戰爭有關<sup>9</sup>。

（一）利簋——牧野之戰，交代武王征商人一事

簋<sup>10</sup>是一種食器，利簋 1976 年出土於陝西的一處青銅器窖內。器體有銘文四行，共三十二字，據考究應造於武王時期<sup>11</sup>。

銘文大意：

武王帶領軍隊出征殷商，在甲子日的早上，歲星當空<sup>12</sup>，大勝。七日後，武王在管地駐軍，賞賜銅器給右史利。利因而鑄造了這件寶器作為紀念<sup>13</sup>。

<sup>7</sup> 馬承源主編，（台北：南天書局，1991），頁 355-357

<sup>8</sup> 李峰《西周的政體——中國最早的官僚制度和國家》，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10），頁 22

<sup>9</sup> 同上註

<sup>10</sup> 音鬼

<sup>11</sup> 王輝，《商周金文》，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 31

<sup>12</sup> 吉兆，有利征戰

<sup>13</sup> 王輝，《商周金文》，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 34-35

利是該青銅器擁有者的名字。銘文顯示利是武王的右史，受武王賞賜，他因而作器記錄這場大戰<sup>14</sup>。利簋的重要意義是記錄了周武王向天下宣布周打敗了商的事實，商已成過去，周室是權力的掌控者。

為何製造青銅器？

那麼利為什麼鑄造青銅器呢？他是史官，本身的職責就是記錄歷史，即使武王沒有對他進行賞賜，利還是要把戰勝商這件大事記錄下來。他得到金屬作為賞賜，即代表他有製作青銅器的權力，這是何等榮耀啊？故其將武王克商之事鑄在簋上。不難猜想其他鑄造青銅器者大多出自這種心態，畢竟王地位超然，得到封賜是很值得慶祝的事。以青銅為媒介，而不以其他隨手可得的材料造器，一來因為青銅材質堅硬有助保存，二來有具體器物能展示給更多人看，三來是能以此凸出受器者（家族）的地位，最後就是青銅器本身有裝飾作用，能讓觀者賞心悅目<sup>15</sup>。

## （二）天亡簋——武王祭天以示權威

天亡簋與利簋並稱西周初最早的青銅器，其內容可補足利簋所言武王到管地之由，又反映了周初的天命觀。天亡簋是在清道光末年出土於陝西西岐山，器體有 8 行，共 77 字。

銘文大意：

在辛未日，武王舉行了盛大祭禮。武王率領西方諸侯，在太室山<sup>16</sup>上祭天。祭祀完畢後，武王由太公望陪同下山。之後武王在宗廟遍祭先王，特別為父親文王舉行了隆重祭禮。文王天命歸德，武王承其大業，推翻商王。丁丑日，武王又舉行了祭禮。太公望因輔助王祭天，得到王之賞賜。他永久感激，因而造天亡簋，以頌王之誇美。

分析：

天亡簋作於武王時期。天亡是器主之名，指的是太公望，也就是後代所說的姜子牙。他曾輔佐周文王及其子武王，是西周的開國元老。利簋指出武王戰勝商人後曾到過管地，而利也是在這個時候受到賞賜，天亡簋或進一步解說武王到此的原因。研究指出，

<sup>14</sup> 牧野之戰

<sup>15</sup> 李峰，《西周的政體——中國最早的官僚制度和國家》，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10），頁 22

<sup>16</sup> 今嵩山主峰太室山

武王此舉是準備出發到太室山祭天封禪<sup>17</sup>，有巡守宣示權威的意味<sup>18</sup>。管地<sup>19</sup>與太室山相距約 50 公里<sup>20</sup>。換言之，武王從管地出發，登上太室山報天地之功，祭祀祖先，祈求庇佑，從而確立統治的合法性，並將這個消息昭告天下。

小結：

從銘文中我們也可以核實周的建立、周王的經歷以及當時的政治局勢，因為這是青銅器的主要題材。將利簋與天亡簋並看，會發現周王常提及推翻商的管治而建立周這個政權，也一再陳文、武二王之善。這些類似的段落重複出現在其他青銅器上，下文也有提及，表示周王認為周氏得位是承天命，故有義務要推到暴政，訴諸於形上力量將統治合理化。

### 青銅器與西周封建模式

封建是周的一種政治模式。周武王成功建立周，因為國土之大難以一人控制，而且要嘉獎協助伐商的宗室人員、各部族和功臣，便把土地、人口、禮物賞賜給他們，讓他們協助管理。這些接受封地的人，被賦予公或侯的職銜，周王一般不會干預封地的內政，所以他們可說是擁有了封地的自治權。封建制度發展下去，公侯會在封地內部進行二次或多次分封，封地就像是國家的縮小版。一層一層下去，自天子以至諸侯、大夫以至於庶人，構成整個封建系統。作為獲得身份和封地的代價，諸侯必須效忠周室，為周王提供軍事服務、覲見周王。

封建的特質我們都能在青銅器中窺見，而且青銅器也能敘述西周盛衰的故事。

#### （一）克罍<sup>21</sup>——西周的分封模式

罍是酒器的一種。克罍其作於成王時期，1986 年出土於北京，有銘文 6 行，長 42 字，又名大保罍<sup>22</sup>。

銘文大意：

<sup>17</sup> 封禪是古代帝王的最高典禮，君主向天地報告重整功業，同時表示接受天命、治理人世

<sup>18</sup> 李學勤，〈天亡簋試釋及有關推測〉，中國史研究，2009（4），頁 5-8

<sup>19</sup> 即今河南省石佛鎮

<sup>20</sup> 李學勤，〈天亡簋試釋及有關推測〉，中國史研究，2009（4），頁 5-8

<sup>21</sup> 音雷

<sup>22</sup> 王輝，《商周金文》，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 47

王說：「太保<sup>23</sup>，以你敬明之心，侍奉先王<sup>24</sup>。我大封土地，供你享用。我封你到燕地為侯，把六族劃歸燕國管理。」克來燕地就任侯，受王封國，於是讓人製作此件罍器，以示紀念<sup>25</sup>。

分析：

銘文中所說的「太保」是指召公奭，他與周室一樣姓姬，曾與周公旦一同輔助武王伐商，也是成王的重臣<sup>26</sup>。因受封於燕國，稱燕召公。成王為表率召公用心侍奉周室，便把燕地和六族封給他，交由他來管治。

## （二）何尊——西周官職的任命

尊是酒器一種。何尊刻有銘文 12 行，總長 122 字，因底部破孔，殘損 3 字，現存 119 字，記錄了成王對何的訓示。在 1963 年出土於陝西省寶雞市郊。

銘文大意：

周成王五年四月，居於成周<sup>27</sup>，後來又折返豐京。四月丙戌日受天庇佑，大吉之日，成王在宮內召見宗子——何，對他訓話：「你的父親一直效忠文王、武王，文王受天命，而武王大敗殷。武王曾祭天祈禱：我要住在這裡，這會成為天下中心。你要謹記先輩的功勳，並效法他們，敬慎祭祀。我順應天意，對你作此訓示。」成王訓示完畢賞賜何貝三十朋<sup>28</sup>，何故作此尊，以作紀念<sup>29</sup>。

分析：

何尊應作於周成王五年<sup>30</sup>。西周青銅器大致承襲商的傳統，但自成王開始，青銅器的銘文長度顯著增加，何尊就是一個好例子。從譯文可見周王並非只是出現在首都，也會在封邑巡視，何就在豐京覲見成王。何是此尊的擁有者，他的身份是「宗子」，負責祭祀致福之事。篇中成王先提及文王受天命和武王祭天兩件大事，繼而表率何的父親，讓何日後用心工作，恰恰是宣示了個人的權威。以上訊息透視了周代官位的世襲——何的父親是祭祀官，他也子承父職，擔任祭祀工作<sup>31</sup>。何尊的銘文為後代解讀周

<sup>23</sup> 官職

<sup>24</sup> 周王，如文、武等

<sup>25</sup> 王輝，《商周金文》，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 47-49

<sup>26</sup> 《書君·奭》：「召公為保，周公為師，相成王為左右」

<sup>27</sup> 今河南洛陽，成王欲遷都成周，但遇上困難。

<sup>28</sup> 金文中用作貨貝的計量單位

<sup>29</sup> 李學勤，〈何尊新釋〉，中原文物，1981 年第 01 期

<sup>30</sup> 李學勤，《青銅器與古代史》，（台北：經聯，2005），頁 186

<sup>31</sup> 李學勤，〈何尊新釋〉，中原文物，1981 年第 01 期

代的行政架構和官職提供線索，雖然未必直指嫡長子繼承權利，也未必完全保證官位的獲取只有世襲這種方式，但不妨將此視為仕途的開始或一種可期的職位<sup>32</sup>。

### （三）多友鼎——西周末年外族入侵頻繁

多友鼎在 1980 年出土於陝西省的下泉村，作於西周厲王時期，有銘文 22 行，共 277 字。

譯文大意：

厲王某年十月，玁狁<sup>33</sup>重兵攻打周京，周厲王命令武公、多友率兵出戰。多友與玁狁激戰半月，四次 都大捷，在戰爭中共殺敵軍近四百餘人，俘虜二十，繳獲戰車合共一百二十七輛，玁狁大敗而逃。厲王得悉捷報，重賞多友，禮品包括酒勺、樂鐘、合金一百多鈞<sup>34</sup>。多友於是命匠以部分合金鑄造該鼎，並在鼎內鑄銘文，感謝周王賞賜，紀念戰爭的勝利，讓子孫後代永遠珍愛祖先的功績。<sup>35</sup>

分析：

多友是鼎的擁有者，他是厲王時期的一名武將，其功績在於成功打敗玁狁，保衛周室。以上譯文除了描述多友驍勇善戰的形象，更有幾個值得留意的地方。（一）：多友與玁狁多次交戰，證明西周後期外族入侵頻繁。（二）：多友不是直接隸屬厲王，而是武公的武將。所以厲王要先命令武公，才能驅使多友出征。（三）武公作為諸侯，有對周王提供軍事協助的義務。

這些線索都鋪墊了周的衰敗，內憂外患接踵而來。西周之初為周天子為穩定人心，分封諸侯，諸侯在封地擁有自治權，其權利與周王無異，日後容易坐大，威脅周王的地位。其次，周室依賴諸侯提供軍事協助對抗外來侵略者，假如諸侯離心，周室將無法控制大局。

### 總結——青銅器作為一手資料的利弊

研究青銅器對了解封建概念起莫大作用。周天子有巡視封國、分封諸侯、任命官員和祭天的職責。受封賞者多是因為服務或保衛當時或歷代的周王，又或者承繼祖先的職責，繼續對王表忠。如此之下，周王透過賦予土地、奴隸等一系列的禮物籠絡人心，

---

<sup>32</sup> 同上註

<sup>33</sup> 音險允，匈奴的一支

<sup>34</sup> 現重約 3000 斤

<sup>35</sup> 王輝，《商周金文》，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 221

受封者感恩戴德，事後作青銅器紀念該事。受封的領地可視為國家的縮小版，周王一般對此不加以干預，因此該處可謂是高度自治。諸侯效仿周王，設區內的行政架構，實施二次或多次分封，不過分封者還是名義上尊周。作為獲得禮物的代價，受封者及其部下必須為周王提供軍事服務，並服從國家安排。

不過青銅器作為史料涵蓋度不足。其製作費用高昂、工序繁複，非常人可以鑄造，故青銅銘文多反映皇室和貴族政治發展，未能從中得知低下層的生活。

參考資料：

《尚書》

司馬遷《史記》

李峰（2010），《西周的政體——中國最早的官僚制度和國家》，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李學勤（2005），《青銅器與古代史》，台北：經聯

馬承源主編（1991），台北：南天書局

王輝（2006），《商周金文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

李學勤，〈何尊新釋〉，中原文物，1981年第01期

李學勤，〈天亡簋試釋及有關推測〉，中國史研究，2009年第04期